

镜与像

——19 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查晓燕

俄国人始终乐于并勇于探索俄国之外的世界。

19 世纪,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俄罗斯迅速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大国。这一百年间,它在以文学的视角关注着本民族、本国的发展的同时,也始终在注视着异国,包括它的邻邦——中国。19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大师辈出。在这些大师们的笔下,中国是经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那么,“中国像什么?”“他们眼中的中国又何以如此?”不同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等欧美国家的一点是,俄罗斯兼跨东、西方,直接与中国接壤。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关系是否使得“俄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迥异于上述国家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呢”?

中国形象,这里主要指俄国作家们在作品(此文暂不涉及文论、书信)中对中国的描述。本文选取的文本属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范畴——一是“文学作品”,二是“游记这些原始材料”。在 19 世纪俄国文学中,中国形象从未间断过,但不同于欧洲文学的是,中国并未成为 19 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发生地。然而,从普希金、冈察洛夫、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人的有关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它们或直接描写中国,或涉及或多或少模式化了的对一个异国——中国的总体看法。这些看法整体上能够代表在当时的时代历史语境中俄国人对于中国的想象与认识。在这篇文章中,文学中所反映的 19 世纪俄国人对中国的集体记忆与集体描述被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以普希金为代表的第一个阶段,以冈察洛夫为代表的第二个阶段,以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为代表的第三个阶段。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并不是对所有可称之为“形象”的东西普遍感兴趣,它所研究的是在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正是在这个研究范围内,我们看到,“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①

在19世纪初叶,中国形象连续出现在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1799—1837)早、中、晚期的作品中。如将其短诗《给娜塔利娅》(1813)、《皇村回忆》(1814、1829)、《园亭题记》(1813—1817)、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1817—1820)第二歌、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0)、短诗《我们一同走吧,我准备好啦……》(1829)、《普加乔夫史》(1833)等连接起来考察,普氏的“中国系列”便呈现得相当清晰。从未离开过俄罗斯的普希金,他的“中国语境”从何而来?根据各种材料我们不难发现,普希金对中国的描述及他本人对中国的想象与认识同17世纪直到19世纪早期整个欧洲都痴迷于“汉风”的“崇洋”倾向密切相关。赛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指出,大约从1765年至1850年之间,“欧洲除了有学识渊博的专家对东方事物作出了许多科学发现之外,实际上还盛行着仰慕东方器物的风尚,这一风尚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每一位大诗人、散文家和哲学家”^②。法语纯熟、精通西欧文学与文化的普希金自然也游弋于这样的语境之中。这一语境几乎同步地存在于俄罗斯,尤其是从“18世纪初开始,如同欧洲的情况一样,俄国人也收集瓷器、涂漆的饰物和一切中国艺术品,生活中充斥着中国的物产;在文学和哲学中也流行起‘想象中的中国’,把中国视为‘理想之邦’,书刊上充满中国的信息;宫廷和上层社会热衷于‘中国的情调’,按照中国风格来装饰、布置皇宫和官邸里的房间,仿造园林艺术和中国式的建筑,在皇家园林里设置中国景物。这种热潮持续到19世纪,甚至更晚;在地域上也由首都扩及外省……”^③这种现象笼而统之地说,既是西欧“中国热”促动的结果,又是人类对“异”的向往的共同心理使然;具体而言,它则直接源于18世纪下半叶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俄国对中国日渐增长的兴趣。迷恋于欧洲的“中国风”的女皇尤其沉醉于中国的物质文化。

“中国花园”是欧洲文学中的一个母题。笔者认为,除中国的亭、台、楼、阁、

① 巴柔:《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② [美]赛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63—64页。

③ 李明滨撰:《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桥之外,中国的花瓶、瓷器、丝绸,乃至“万里长城”、“汉学家的图书馆”^①均可以看成“中国花园”母题的延展。这一母题直接与18世纪中叶风靡于英、法、德等西欧国家的“中国花园热”有关。在时间上,俄国的“中国花园热”与欧洲基本一致^②。普希金在皇村学校读书六年,皇村^③这座皇家园林近在咫尺,其中的中国景观较为集中地体现在诗人如下的诗篇里:《给娜塔利娅》、《皇村回忆》、《园亭题记》和《鲁斯兰和柳德米拉》。

诗歌少年于梦里的凉亭内与意中人相会:

当夜色沉沉静寂无声……

我单独和地置身凉亭

(《给娜塔利娅》,谷羽译)

中国凉亭是普希金“爱的寓所”——它不仅存在于诗人的梦境中,还存留在他的回忆里:

请怀着虔敬的心情

到这儿来吧,年轻的过客,

到这荒僻的爱的寓所。

我一度在这儿幸福地爱过……

(《园亭题记》,查良铮译)

史景迁认为,在18世纪,英国、法国、德国进入了园林时代,这些国家不惜重金建造园林,而这些园林的设计融汇了不少欧洲人所信奉的中国法则。顾彬在谈及“1773年至1890年德国文学中的中国”时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指出,18世纪的知识分子十分重视中国的花园,中国花园对他们来说代表着一种自然态度。实际上,俄国也是如此。在普希金描写中国花园的诗中,《皇村回忆》(1814)最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花园的典型布局。该诗的开始便是对这座花园的描绘:

① 参见胡亚渝:《永恒的变体——从“中国瓷盘”到“汉学家的图书馆”》,载于乐黛云主编:《欲望与幻象——东方与西方》(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东京]中国学者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 中国园林第一次(17—18世纪)西传时,受其影响最大的是英国和法国,其他还包括德国、瑞典和俄国。

③ 历代沙皇的行宫,始建于1708年,经彼得大帝、伊丽莎白女皇两代沙皇的建设,18世纪中期粗具规模,1770年,叶卡捷琳娜女皇实行改建,最终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和公园的组合,其中有数处中国景色,像叶卡捷琳娜公园里湖畔的“中国亭”、亚历山大公园里的“中国桥”和“中国城”等。与皇村同时代的中国风格的园林又如: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郊“王后岛”上的“中国宫”(建于1751—1771年间)。

万籁俱寂,空谷和丛林都安睡了,

· 远方的树林笼罩着白雾;

小溪潺潺,流入丛林的浓荫,

微风徐徐,已在树梢上入梦,

.....

瀑布从嶙峋的山石上

像碎玉河直泻而下,

在平静的湖水里,神女们泼弄着

微微荡漾的浪花;

远处,宏伟的殿堂悄然无声,

凭借拱顶,直上云端。

(王士燮译)

皇村中国式花园留给诗人的记忆是这般刻骨铭心,以至于直到1829年,在与上首同名的诗中,进入中年的普希金还在遥想中把她忆起:

我总要想起你,想起这幸福的地方,

总要把这些花园怀想。

(顾蕴璞译)

花园代表一种自我世界。“花园”这一概念通常又与鸣唱的鸟儿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意象的整体。《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中,鸣响着的是“中国花园”母题及其变奏,即女巫花园与花园里的中国夜莺。诗人这样吟咏道:

这是个十分迷人的所在:

它比亚米达的花园还美,

比所罗门皇帝、塔夫利达公爵

拥有的花园还要美。

.....

五月的风给醉人的原野

吹来一阵又一阵的凉爽,

而在深邃昏暗的树林中

黄莺在晃动的枝头歌唱

(余振译)

在戈宝权看来,普希金在此诗的第二歌中写下“黄莺在歌唱”^①不是偶然的,皇村中的各种中国式的建筑与当时在俄国宫廷中间风行的“中国热”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第二歌中这一段对中国花园一气呵成的描写、赞美同《皇村回忆》所描绘的皇村中国花园的景色——山谷、岗坡、流水、和风、树丛、草场、杨柳、瀑布、湖面、月光等遥相呼应。直到19世纪60年代,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7)中的“中国式的亭子,英国式的花园”(第一部第五章“地主”)、屠格涅夫的小说《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1868)里的“中国瓷盘”(第二十节)一方面都还在传递着18世纪“中国花园热”的余温,另一方面则显示着套话的所指在能指隐退后仍然具有的生命力。

17—18世纪,在欧洲大陆,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被卷入了“中国热”的潮流,文学家们也不甘落后。18世纪更是欧洲历史上最倾慕中国的时期,就是人们所说的“哲学时代”。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到自彼得大帝起主动向欧洲发达国家靠拢的俄国。19世纪最初的十几年正值普希金的少年时代,18世纪的影响依然清晰可寻。普希金在14岁时写下了流传后世的第一首诗《给娜塔利娅》,诗行间对中国人的评价是在比较中进行的:

我并非是宫中的君主,

不是土耳其人或黑奴;

谦恭斯文的中国人,

粗暴无理的美国人,

也都不合乎我的身份,

别以为我是德国佬……

(谷羽译)

诗中提到土耳其人、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中国人是“谦恭斯文的中国人”

^① 原句为:И свищет соловей китайский во мраке трепетных ветвей。在现有的中译本中“соловей китайский”有两种译法,即“黄莺”和“中国夜莺”。

人”、美国人是“粗暴无理的”、德国人则是“德国佬”。“谦恭斯文的中国人”印象模式的来源应是“将中国视为‘礼仪之邦’这一‘中国幻象’”。这种认识依托的背景又是什么呢？——如果说“自15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在寻找一种原始社会。他们想通过对原始社会的描绘，来批评自己的社会和文化”^①的话，那么，在叶卡捷琳娜女皇执政期间（1762—1796），以诺维科夫、冯维辛、杰尔查文、拉吉舍夫等为代表的俄国文学文化界的精英们终于将中国锁定为“原始社会”，正是他们在俄国掀起了介绍、翻译、出版中国传统文化成果的浪潮。当然，他们向往、审视和想象一个根本不同的“他者”社会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在这些沐浴过启蒙之光的作家们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理想的典范——皇帝仁慈、政府清廉、百姓勤劳；而18世纪下半期，还有一个群体——汉学家们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兴趣也正浓厚，出现了俄国汉学史上译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典籍的一次高峰。所有这些形成并强化了俄国人头脑中的一个概念：在中国这个哲人的国度里，人们个个彬彬有礼。由此可见，“谦恭斯文的中国人”这句套话表明，俄国的启蒙运动为俄罗斯接触中国文化迈进一步之后，俄国人中间萌生出了一种期望能在异域实现和满足的“乌托邦理想”，它具有质疑现实的特点和“社会的颠覆功能”。

自西欧各国“汉风”劲吹并一路吹进俄国以来，19世纪上半期，中国对俄国和西方来说仍然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哲学圣地。放眼欧洲文学，“中国哲人”是与“中国公主”、“中国皇帝”并齐的三个基本的中国形象，俄罗斯文学的情形与之接近，只不过缺席了“中国公主”的形象。在18世纪，由于冯维辛、拉吉舍夫、杰尔查文等作家对孔子作品的翻译以及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它的塑造^②，中国的孔子成为了一个“圣人+哲人”的形象——这一成型的印象延伸到了19世纪。在普希金2369号手稿本中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几行诗句里，孔子就是“谦恭斯文的中国人”的化身：

[孔夫子]中国的圣贤，
教导我们要尊重青年——
[为防止他们迷途]
[不能急于加以责难]
[只有他们肩负着希望]

① [德] 顾彬讲演、曹卫东编译：《关于“异”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页。

② 详见陈建华：《18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汪介之、陈建华著：《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

[使希望……]

普希金眼中的孔子是圣贤，是导师，这种认识尚停留在将其囿于知识阶层认知的层面。距诗人逝世已有二十多年的50年代末，冈察洛夫终于在上海市郊田畴间的农夫身上真切地感受到了孔夫子屹立于中国民间的形象^①。孔夫子——这位中国圣哲的代表，在俄国知识界人们对他的顶礼膜拜一直延续到了托尔斯泰时代。托翁在《中国的贤哲》（1884）一文中毕恭毕敬地称孔子为“中国的先师孔夫子”。在普希金时代，“孔夫子”与“长城”一并成为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国幻象”的核心。《我们一同走吧，我准备好啦……》一诗这样提到古老中国的长城：

我们一同走吧，我准备好啦；朋友们，无论你们去到哪儿，
凡是你们想去的地方，到处我都准备跟随着你们走，
只要躲避开我那傲慢的人儿：
哪怕是去到遥远的^②中国万里长城边，
哪怕是去到喧腾的巴黎，或者最后就去到那些地方……

（戈宝权译）

“朋友们”系指有普希金的朋友、汉学家比丘林（1777—1853）和希林格（1786—1837）等参加的中国考察团的成员们，他们拟于1830年3月前往中国。至此，诗人终于直白地表达了“要去中国”的愿望，可诗行传递给读者的却是无可奈何“逃离”的信号，其创作时的心态似乎与前面提及的描写中国的作品不大一样。为什么？——一方面，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层面可以这样理解：“在文学作品中，遥远的异国往往作为一种与自我相对立的‘他’（The other）而存在。凡自我所渴求的、所构想的，以及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都会幻化为一种‘他性’投射于对方。”^③那么，在写作此诗时，现实中的什么令普希金的渴求与构想无法得到满足呢？——主要是由于个人感情受挫，诗人从而萌生出了逃避主义的念头。在此诗写成的前一年，即1828年底，诗人与“莫斯科第一美女”冈察洛娃相识并爱上了她，不久便托人向她求婚，遭拒，阻力主要来自女方的母亲。1829年10

① 冈察洛夫著、叶予译：《“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上海”一章，第469页。

② “中国”一词前面的修饰语在最初的手稿上是“平静的”、首次发表用的是“停滞的”、再版时改为“遥远的”。

③ 乐黛云：《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载于[美]史景迁讲演、廖世奇与彭小桃译：《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页。

月,普希金从高加索返回后,冈察洛娃的态度仍然冷淡,其母也仍未应允这桩婚事。于是,郁闷的诗人写下了这首诗,两个星期后又致信沙皇政府,正式提出出国的申请:

目前我还没有结婚,也没有担任公职,我想去法国或意大利作一次旅行。如果我的要求不能获准,则请准许我随使团访问中国。(1830年1月7日,致亚·赫·卡肯多尔夫的一封信,张铁夫译)

几日后普希金接到拒绝的复函。尽管诗中首选的逃离的目的地是中国长城,而信中则是法国和意大利,但是排序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获知,中国的万里长城是诗人理想中既安全又宁静的避风港。另一方面,“要去中国”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20年代前半期的南方流放阶段,由于与东方在地理空间上的拉近,普希金与居住在那里的东方民族及其他们的文化之间的心理空间也缩短了。而20年代后期与比丘林的交往进一步加深了诗人对中国的向往。

30年代,普希金还在关注着中国。在《普加乔夫史》中,他称来自中国的卡尔梅克人是“爱好和平的”,客观地评价他们“忠诚地为俄国效劳,守卫着俄国的南疆”的功绩,直到决斗身亡前一年,在《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里,又提及“草原上的朋友卡尔梅克人”。

巴柔认为:“在某一特定时期,某种特定文化中或多或少存储了一批能够直接或间接传播他者形象的词汇。”^①照此说法,不难整理出普希金笔下中国形象的一组词汇——“谦恭斯文的中国人”、“中国的圣贤”、“中国夜莺”、“中国长城”。可以说,从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这些词就是用于形容在俄国文学乃至俄国文化中俄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的。同时,我们还能发现两点:首先,尽管我们只能在普希金的一些诗歌和其他作品的零散段落里找到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简短的隐射,但是诗人笔端的中国形象都是正面的,这是因为普希金生活与创作的年代正逢浪漫主义文学兴盛于俄国之时,从欧洲蔓延而至的浪漫主义潮流也将它把东方视为异域奇境这一大的语境带了进来。其次,诗人从未接触过中国人,从未习读过中文;虽一直关注、赞美和向往中国,但从未到过中国,他有关中国的知识与认识都是间接的。然而,普希金的中国形象却并非都出自想象。诗人从小酷爱读书,其最初的“中国记忆”不仅来源于家中的82种有关中国的藏书,

① 巴柔:《形象》,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2页。

而且还有童年时代家中收藏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著述,尤其是对传播中国文化有过重要功绩的伏尔泰的著作,普希金一生都在追随这位启蒙之子^②;进而,普希金的“中国记忆”从理念认知转化为直观认同则直接受益于皇村读书生涯期间皇家花园内中国文化氛围的熏染;再有,诗人头脑中中国形象的不断累积一方面得益于他生活的19世纪早期,无论欧洲还是俄国仍在风行的东方学,所以,诗人虽未能跟随比丘林等前往中国考察,但注视中国的热情丝毫未减^③,另一方面又得益于阅读皇村同窗从流放地和中俄接壤处寄至的书信。

普希金笔下的中国形象就是这样贯穿在其生命的各个时期。

二

欧洲文学中关于中国形象的描写,最大量、最集中地体现在其游记文学之中。从欧洲文学的大背景来看,自1840年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以来,描写中国的文学大量涌现,其中就包括游记。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对比较研究——形象学这一分支的探索中,研究者们尤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游记上。

不同于普希金时代,进入19世纪中期后的俄国,文学中出现了花整段章节对中国的描述,最典型的范例就是冈察洛夫的旅行记。

冈察洛夫(1812—1891)是19世纪唯一一位深入到中国腹地并对他所亲历的中国作了最详尽描述的俄国作家。在随俄国舰队进行历时两年半(1852—1854)的环球航行中,他担任海军中校的秘书,负责全程记录沿途的所见所闻。“巴拉达”号战舰从彼得堡出发,沿途经过不少国家,在中国的香港、上海作过一段时间的停留。1858年,冈察洛夫撰写的两卷本的航海旅行记《“巴拉达”号三桅战舰》出版,其中专辟“香港”、“上海”两章,详细记述作者的见闻感受。

顾彬将西方对异国的反映总结为两种基本态度,即害怕与渴望,而在《“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这两种态度都不明显,倒是客观的平视是它描写的主要特色。

冈察洛夫从不同侧面详尽地描述了中国人生气勃勃和精力充沛的特点;中华民族善于经商的本领;中国普通民众身上所体现的杂乱、无序、肮脏的城市与乡村生活;中国城市街头巷尾那嘈杂、忙乱、叫喊与方言交混的景象。还有,城市城墙的封闭性,扬子江上浑浊的水色,城市里稀薄的文化生活气息……甚至细

① 详见拙著《普希金——俄罗斯精神文化的象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的第四章“呈现理性的运思 揭示生命的真理——普希金的启蒙主义思想”。

② 在使团出发三个月之后,普希金仍在阅读《中华帝国概览》等书,并且在其编辑的《文学报》上刊登比丘林一行人在中国考察的情况报道以及他们写回的书信。

到,诸如饮食(喝茶人身份和喝茶方式的不同、食物种类等)、殡葬、宗教、钱币、雕刻等文化习俗。在上海停留期间,正值小刀会起义,透过硝烟,性格内敛的冈察洛夫在看到中国不少“黑暗面”的同时仍然捕捉着其中的亮点与情趣。无论是对于香港,还是关于上海,他都不止一次地提及中国人的脏乱,但他也夸赞上海街头苦力的整洁、礼貌,甚至像欣赏一幅画似地描述苦力们的衣着和在他看来奇妙无比的劳动工具与吃饭家什——竹扁担和筷子。作者特别关注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他在这些平民百姓沉重、平庸的日常生活里发现了只属于他们的生活乐趣:随处可见的家居场景——吃饭、做手艺活;给孩子喂奶的母亲;以木制小柜为谋生工具的街头理发匠;弹奏一种吉他般乐器的赤膊小伙;月光下划着舢板的少女……在描写了所能描写的一切的同时,冈氏还剖析了中国国民的心理结构、中国社会的危机与出路。

“套话”是形象的一种特殊而又大量存在的形式。从冈察洛夫的这个游记文本中,我们发现了如下几个有关异国的固定套话:

勤劳智慧的中国人——这是一个关于他者的套话,几乎“在每一历史时刻均可使用”(巴柔语),属于确实具有稳定性的套话。它正如“开明皇帝”、“中国长城”一样,是一个被西方作家反复使用的中国形象。在上海停留的二十多天当中,冈察洛夫对这座城市进行了追踪观察与探访。他赞叹道:

中国人是个活跃的、精力充沛的民族。几乎看不见游手好闲的人。他们熙熙攘攘,忙个不停。嘈杂声不绝于耳。到处都可看见搬运工人……这里的人和我们在香港和新加坡见过的不同。他们温顺、朴实,衣着整洁。男女都是如此。(第440—441页)

在西方有关中国形象的文本中,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一直是受到肯定的,在冈氏这里也是如此。这种认同是人们对异国的一个总体看法与感受,而这些看法与感受是在一个文学化也是社会化的进程中获得的。上述文字告诉我们,作者触摸到了中华民族的不可抵御的力量,继而,他作出了更为明确的判断:

中国百姓从境内涌向四方……他们的足迹遍布各地,不仅及于近海各岛,而且南达爪哇,东达加利福尼亚。到处都有很多中国人,他们可以经商,又是熟练出色的工匠役作……这个民族注定要在贸易中起巨大作用。也许,并不仅仅限于贸易。(第424页)

在这部游记中,作家几次从不同角度提及“中国人善于经商”的特点,又譬如:

中国人具有求实和务业的精神……新教徒们第一步是来做生意,第二步才是传教。中国人对第一步大为高兴,对第二步自然接受,认为这对他们毫无妨碍。(第464页)

尽管冈察洛夫十分赞赏中国人的经商才能,但并非欧洲的“注视者”对此都一致认可——在比《“巴拉达”号三桅战舰》早问世一百一十年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法国人孟德斯鸠从比较西班牙人和中国人的性格的角度这样论道:“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①“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②由上能够看出,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作家眼中,“注视者”自身及其所在国的处境、条件与文化框架会导致在某一点上的异国形象往往大相径庭。

阴柔的中国男人与漂亮的中国女人——按照维克多·谢阁兰的理论,异国情调写作不是重塑他者,那样做或许将永远地失去他者。“异国情调写作是对它的不可穿透性的(愉快的)承认:它在通向不可及之物的晕眩中进行表演。”^③

冈察洛夫极不喜欢中国男人的外表和精神面貌:

多数中国人面相衰老,剃着光头……他们的脸上堆着皱纹,无须,看上去同老太婆的面孔十分相像,没有一丝一毫的丈夫气。(第274页)

这些剃刮得闪光发亮的头皮和面孔,裸露的暗黄的躯体……面皮鲜嫩,表情狡黠,缺乏丈夫气概……(第278页)

多数中国人的面皮确实像女人那样光滑,几乎不见须髭……他们也喜欢把面皮刮得光光的。看得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很聪明,或者更准确地说,工于心计,狡黠多谋。(第295页)

① [法] 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8页。

② 同上,第316页。

③ 让-马克·莫哈:《文学形象学与神话批评:两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交汇与分析》,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9页。

按照顾彬的观点,欧洲知识分子对“异”的探索与他们对女人的探索紧密相连。在俄国文学中,我们看不到图兰朵式的中国公主形象,但在这部游记中还是能够发现对异国女人——中国普通女子的描写。尽管拖着大辫子的中国男人让冈察洛夫感觉不悦,但娇小的中国女人在他的眼中还是相当美丽的,她们:

一律长裙拂地,但我有幸乘清风吹来、裙裾乍飘之际,亲眼见识她们的纤巧金莲。中国女人发髻高叠,乌云堆翠,金簪银钗横贯脑后,模样倒也相当标致。(第307页)

在“香港”一章中,作家着重描写了一位在月光下划着舢板往“巴拉达”号运货的妙龄少女:

借着月光我们看到船上有两个女人的身影……我们上了小船……月光照着两人的面孔,一个是老太婆,另一个年约十五岁,白皙娇弱,一双黑眼睛虽然细眯着,却很漂亮,脑后的乌发绾着一支银钗。“到俄国三桅战舰去!”我们说。“两个先令!”年轻女子用英语讨价说。“这样的可人儿值一百英镑!”我的同伴说。“太贵了,”我说。“看来,你不是本地人吧?因为你很白。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波谢特追问道,一面凑身过去。“我是澳门人,我叫埃托拉。”她用英语答道……“长得真漂亮!”我的同伴赞不绝口地说……(第308页)

在上述片段中,冈察洛夫从一个俄国成年男性的视角品咂着中国女子所独具的东方美,他由衷地赞赏中国女子的乌发、细眼和娇柔的体态,使用了“标致”、“漂亮”、“姣好”等形容词,中国女子的腴腆似乎也成了构成美的画面的一大元素。显然,在这位俄国作家的字里行间,“异国情调”存在于写作不可探测之物时的愉悦之中。

灵巧的中国人——这一套话对我们来说也不陌生。冈察洛夫对中国的手工艺品极其欣赏:

众所周知,中国雕刻技艺高超,木、石、骨,全都胜人一筹。不论哪个民族,甚至德国人也不会有这种耐性,刻功如此精细利落,或许只有上帝知道这种功夫的价值。看来,这里的人力和时间毫无价值可言。

(第443页)

与此同时,作者又一再表示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把这么多人力和时间花在这些不值钱的工艺品上?他是该对什么表示惊诧——中国人的技巧还是制成品的毫无价值?在他眼中,这都是些无聊的琐事。尽管不甚理解,但他者的不可穿透性对冈察洛夫而言丝毫不是攫取的目标,而是丰富自我的途径之一,乃至二十年后,在与当年的同行者们相聚共忆往事时他还津津乐道于当时完全陌生的异国风景是怎样地吸引他。在二十年后对旅行记作的补叙文字的结尾处,冈氏以其对“他者的不可穿透性如何成为丰富自我的途径之一”的切身体会向读者强调:

远航可以使您的记忆和想象注满美丽的风景、迷人的故事;丰富您的智慧,验证您道听途说的一切……(第799页)

与冈察洛夫对中国手工艺品的评论形成呼应的是果戈理发表于1835年的小品文《论现今的建筑》中的一段关于中国的议论。作者以赞叹的口吻论及东方建筑:“东方建筑拥有欧洲人从未利用过的东西……它们构成东方趣味最迷人的发明……”^①继而果戈理从东方建筑转向对中国,不是中国的建筑而是中国人加以评点:“唯有中国人的趣味——可以称之为在所有东方民族中最渺小、最不足道的趣味——由于某种时兴而在18世纪末传到我们这里来。还好,欧洲人按照自己的惯例立即按自己的方式将它改善,并赋予它那样一种魅力,这种魅力是它原本并不具有的,正如其民族并不具备充沛的精力,尽管教养很高。”^②在此之后,话题是印度和埃及的建筑——地下陵墓,口气又是赞叹的。可见,在30年代的果戈理那里,“帝国语境”的端倪就已现形!这不足为奇。18世纪的欧洲就有人厌倦了当时流行的中国风气。18世纪之后,欧洲的“中国热”渐渐消退,在以后的一两百年间,中国一直处于被侵略、鄙视的地位,中国文化的价值呈现出弱势的状态。诚然,这还与果戈理文化视野的局限性有关,其世界历史知识结构欠缺训练有素的学者所应有的均衡。

不讲卫生的东亚病夫——这一套话基本等同于在法国和欧洲被普遍使用的

① [俄]果戈理著、彭克巽译:《果戈理文论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95页。

② 同上。

“黄祸”。冈察洛夫在爪哇岛的一个村子里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人：“游蛇般的黑长辫子”，“肤色蜡黄，神情虚弱，尖长的指甲看上去像鸡爪”——白描般的文字造成了很不舒服的阅读效果。接着在新加坡，他开始认真地打量侨居当地的中国人的生活，发现中国人总是赤身露体：

不加掩饰的家庭内在的生活方式，虽说别具一格，却不能引人入胜……（第 278 页）

中国人聚居的木房区十分肮脏，让人想逃：

这里的一切不仅有碍观瞻，而且浊气扑鼻。（第 278 页）

“不讲卫生的东亚病夫”还体现在中国饮食上。不知为何，冈察洛夫竟然那么讨厌中国的饮食，尤其厌恶“令人窒息的中国油味”，甚至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仅“上海”一章中对气味格外敏感的作者就 13 次提到令他恶心的气味。又譬如在新加坡的中国帆船上：

经过一座炉灶，旁边有一个烧饭的厨师，一股呛人的臭气从烟囱里扑鼻而来……（第 277 页）

接着到了中国侨民的聚居处：

架子上挂的或者摆的货物，多数也是叫人趋避唯恐不及。满眼都是生肉、烤肉、腌肉、鱼、蟹、虾等类东西。还有一种流动熟食车，铁锅、煎盘俱备，煮着汤面、盛着稀粥或者肉冻……（第 278 页）

到了香港，那种味道仍然挥之不去：

店伙嘴里也喷出一股恼人的蒜臭。此外，还混杂着隔壁生食店传来的一股死尸般的恶臭，那里有晒得腐败的生肉、成串的生鱼和看了教人恶心的五脏六腑，头蹄下水等。（第 306 页）

就这样，冈氏笔端既有令人愉悦的正面的他者类型，也有令人厌烦的贬义的他者类型。还应注意的是，一个“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像”，譬如“黄祸”，“一旦成为套话，就会渗透进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并不断释放出能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对他者的看法”。^① 这里，我们不去探究上述套话的最初制作者，但想说明，这些套话不仅存在于俄国文学异国形象的文本中，而且反复出现在 19 世纪中后期西方文学有关中国的描述中，所以说，套话具有高度的多语境性。

冈察洛夫觉察到了各地的中国人还是有所不同，并且在比较之中对他们作了实事求是的描述。在上海他注意到，不同于香港人和新加坡人，这里的人们温和、质朴、相当整洁，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穿戴得干干净净；连搬运工人都彬彬有礼，“街道上的气味也较香港为少”。因此他觉得：

一切都那么典雅，甚至充满诗情画意：竹扁担、砖堆、洁净的服装、长辫子，还有那随便便戴在头上的灰色薄毡帽。（第 441 页）

就整体而言，《“巴拉达”号三桅战舰》对中国人的印象，不分中国本土抑或海外，比较一致。在旅行记中，作家还把中国人同欧洲人、印度人、马来人等作了比较并得出结论：“印度车夫迈着大而缓慢的步伐，从容而又仪态高雅地跑着”；“一个面容不修的中国穷汉，戴着草帽，大汗淋漓地负重而行”。在酷暑烈日下，“欧洲人或者闭门不出，或者藏在游艇篷下、马车厢里。只有印度人能够伸开四肢，躺在船上大睡特睡……再就是剃光了半个脑袋的中国人，扳桨摇橹，奔波于港口水面，或者手持榔头，在欧洲海船上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再不就是肩扛手提，搬运货包”。在作者笔下，印度人就是这么“匀称健美”、“雍容高雅”，动作表情渗透着华贵、慵懒和悠闲；中国人则是“皮肤微黄”、“奔波忙碌”，呆板乏味；“老气横秋”，“缺乏丈夫气概”；马来人“近于褐黑”、“撅嘴拱腮”。这些文字显示出冈氏对中国的轻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中国。19 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失去了往日“中华大帝国”的威慑力，一变而为“懦夫”，受到西方人、俄国人普遍的轻蔑与鄙视。

上述固定模式是与大量的意识形态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毋庸置疑，异国形象能够讲述出“注视国”文化中存在的一些事实，单纯从文字上看，这些事实的表

^① 孟华：《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90 页。

述有时往往不是那么直接,难以与其他事物联结。冈察洛夫进行环球航行之际,正是沙俄的扩张野心自彼得大帝以来仍未衰减之时。至此,俄国对亚洲、对中国的兴趣依旧浓厚。“帕拉达”号出航的直接原因是俄国政府试图打开闭关锁国的日本的大门,进而插手中国;停靠中国则是想分享列强在中国已经获得的权益,即要求清朝政府开放门户,允许俄国通商。因而“巴拉达”号三桅战舰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说到此,我们不妨这么理解“异国形象”的内涵:它“能够将一些未曾得到清楚定义并且属于人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范畴的民族现实移植到一个隐喻的层面上来”。

冈察洛夫基于亲历之上的文字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与真实性。在形象学研究中,狂热、憎恶、亲善这三种态度以清楚、固定不变和恒久的方式构成了诠释异国、阅读他者的各种最明确的表现。在《“巴拉达”号三桅战舰》中,冈氏的态度大体符合上述的第三种。这位作家始终抱着童真般的好奇心,以“我在亲眼探索中国”的姿态,既陌生又亲切地审视着中国的一切——因此,在他的视阈中,遥远的中国已经不是单色谱的“普希金式的美丽幻象”。冈察洛夫的话语令中国褪去了神话般的光辉,从此,中国不是只能在俄国人的想象中“言说”。

冈察洛夫属于特例。在19世纪中期,一些没有到过中国的作家对于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中的某些象征性的形象也并不陌生,甚至能够信手拈来地运用到作品中。屠格涅夫在《罗亭》(写于1855年,1856年发表)中用“中国泥人”(也可译为“中国的大头娃娃”)来比喻主人公罗亭性格的一大特点,即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他看到结局临近了,内心不免感到几分惶恐,尽管任何人看到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举目观望,一副镇定自若的模样,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点。难怪皮加索夫有一次谈到罗亭时,说他像中国的泥人,总是头重脚轻。(冯加译)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1863)中,只有一小段议论性文字刻画了中国人,不过是以反观,即从“中国人眼中的欧洲人”的视角出发的。车氏从具体的生活习性、外表两方面进行描述。首先,“中国人看不出欧洲人彼此之间的区别”,在中国人看来,“欧洲人全是‘不知礼仪的红毛鬼子’”,“欧洲人置身中国人当中,面貌和举止都是一个模样”;其次,中国人发现欧洲人:

不吃蟑螂和海蛆,不把人大卸八块,全都一样地喝伏特加和葡萄酒,而不喝大米酒,甚至中国人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唯一的与自己接近的习惯——喝茶,他们也完全不像中国人那样喝法:他们在茶里放糖,而不是光喝茶。(魏玲译)

在车氏的文字里,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学中大量使用的“洋鬼子”、“老毛子”的套话现出了雏形。从车氏的这段描写中还能听到如下的潜台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有自己认为满意并骄傲的生活方式。巧得很,二十一年后托尔斯泰的一段话似乎在特意回应着车尔尼雪夫斯基:“中国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像我们欧洲人。他们知道我们为何生活,但不仿照我们的生活。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好些。”^①中国曾经是欧洲人“崇洋倾向”的对象。“中国之于欧洲,她是遥远风情、神秘传说、雅致生活、富足国度的同位语。俄国在18世纪就对中国表示出热情,在19世纪这种对中国的好感还在一定社会阶层的生活中继续,特别是对中国物品的喜好。然而在文学领域,情况却与实际生活存在着距离。普希金、果戈理、冈察洛夫,还有他们之后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将异域的一切纳入‘本地’、‘本族’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审度、品评中国的视角既有仰视,又有俯视,也有平视;既具崇洋倾向,又含错误认同。”^②他们眼中的中国既静止不动,又骚动不安,中国人既勤劳、聪慧、善良、诚实,又懒散、蒙昧、狡诈、卑琐。

三

卡雷第一个主张在研究国际文学关系时,不要拘泥于考证,要注重探讨作家间的相互理解,人民间的相互看法、游记、幻象等。

中国形象继续存在于19世纪下半叶俄国作家的游记中,不过,在中国形象的演进过程中,特别是到了《“巴拉达”号三桅战舰》出现的19世纪50年代后期,较低层次的中国形象日趋凸显,与此同时,它又与较高层次的中国形象并存共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从普希金到冈察洛夫,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契诃夫,“俄罗斯从飞扬的青春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壮年。一个民族在它的青春时代大

^① 参见《中国的贤哲》,载《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倪蕊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71页。

^② 查晓燕:《异国形象的解读:“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简论19世纪俄国作家的两部旅行记》,载于王奇主编:《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国际论坛会议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308页。

多是以一种勃勃的生气观望其他的民族,关注更多的是对方积极向上、健康明朗的一面。而伴随着自身的成熟与强大,它会注意到阳光下面的阴影,会以冷静、挑剔的眼光审度、指点(有时是故意放大)对方的“阴暗面”。^①

普希金像伏尔泰一样向往着中国、褒扬着中国人,冈察洛夫基于切实认识之上对中国人有褒有贬,那么,契诃夫呢?

从萨哈林岛返回后,契诃夫(1860—1904)用了四年的时间写成《萨哈林旅行记》。该书1895年问世的单行本共二十三章,其中有七章(第四、六、七、十一、十二、十四、二十三章)九处提到中国或中国人,均是点到为止。在这位短篇小说大师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勾勒、描写中,其医生职业的痕迹比较凸显,即从细微处着眼。在外表上,中国人“细眯眼睛”;在精神状态上,中国人是“鸦片嗜好者、肮脏、病态,是梅毒的传染源之一”;在社会阶层上,中国人从事的都是“拽渔网”、“看管‘卖堂’”之类的低级的、仆役式的劳作。总之,《萨哈林旅行记》中的中国人是殖民地“贱民”的形象:病态,没有活力,看不到希望。而在书中,“中国”这一概念就是“土布和烟草”的同义语。难道这就是曾在书信中于前往萨哈林岛途经中国瑗珲城时,把中国人称为“善良的和相当聪明的人民”、将黑龙江赞为“一条非常美丽的河流”的契诃夫?!显而易见,契诃夫的中国图景全然缺失了普希金的敬意与崇拜,是灰色的视界,而非明丽的境域。其实,早于《萨哈林旅行记》,在80年代,契诃夫已将中国由异域空间转变成了殖民空间,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1883)结尾处将瘦子的姿态比喻为中国人,与《萨哈林旅行记》中如出一辙:

瘦子伸出三个手指头握一握手,全身弯下来鞠躬,跟中国人那样地赔笑:“嘻—嘻—嘻!”(汝龙译)

19世纪下半叶,东方的异质性、怪异性、落后性、柔弱性、惰性存在于欧洲文学中,也不时地展现在契诃夫的笔下。这些负面看法的源头何在?其中的一个原因应当引起重视——伏尔泰否认中国有发展的能力这一思想后来衍化成了固定的观念,它在欧洲人对中国的思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在伏尔泰之后的岁月之河里,在启蒙思想于俄国知识界流播的进程中,它怎么可能不影响到契诃夫这样的大师级的作家们?!《没意思的故事——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1889)第三部分就是一个明证:

^① 查晓燕:《“异”之诠释:19世纪上半期俄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俄罗斯文艺》,2000年增刊,第60页。

真的,科学究竟给过人类什么东西呢?可不是,有科学的欧洲人 and 没有任何科学的中国人中间,那差别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也只限于表面上。中国人不懂科学,可是他们因此损失了什么呢?(汝龙译)

这里,与“中国人”链接的词汇是“没有任何科学”、“不懂科学”。“在不同时期,中国、印度、非洲和中东都起过对衬西方的作用,或者是作为理想化的乌托邦、诱人和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或者作为永远停滞、精神上盲目无知的国土。”^①显然,契诃夫上述三部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属于张隆溪所说的第三种。

异国形象像一面镜子能够折射出形象塑造者的影子,是一种言说自我的表征,“言说自我”是通过“言说他者”这一方式而实现的。我“注视”他者,他者的形象也就传递出我自身的某些形象。若是从这一层面观照,契诃夫的这种幻想性的轻视,颇有殖民主义文化立场的味道。他的“两面派”态度并不令人费解。首先,这与1840年以后西方文学对中国和中国人形象塑造态度的变化同步,即“不断地有意无意地对照耶稣会士和启蒙哲学家塑造的理想的中国形象,建立一个完全相反的新形象”^②。在19世纪,西方与中国处在“开放帝国”与“封闭国族”这一不平等的“注视”与“被注视”的关系中。西方对中国事物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野蛮”、“非人道”、“兽性”——这些形容词通常被19世纪的人们用来总结对中国人的看法。人们说起“中国人”时,往往把它当做一个密集的、不可数的、模糊的整体,或是“中国人群”。其次,如果说契诃夫在《萨哈林旅行记》的叙述中始终搀杂着一种殖民心态,那么,这一心态又是如何形成的呢?19世纪俄国地理上的大发现客观上培植了俄国人的这一心态。19世纪前半期,俄国的旅行家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探险活动,大大扩充了科学家关于地球上许多未经考察角落的地理和民族的知识。俄国的航海家在19世纪前半期环绕地球航行约四十次,北冰洋水域、南极大陆海岸、太平洋岛屿、阿拉斯加、库页岛(萨哈林岛)、阿穆尔河下游等都与俄国人的名字有关。19世纪下半期,俄国地理学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1856—1857年,谢苗诺夫首次深入天山,他的远征给日后俄国科学家接连卓有成效地考察西伯利亚和中亚打下了基础;在俄

^① 张隆溪:《非我的神话——西方人眼里的中国》,载于[美]史景迁讲演、廖世奇与彭小楠译:《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7页。

^② [法]米丽耶·德特利:《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载于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8页。

国革命运动史上颇有影响的克鲁鲍特金也是一位地理学家,他考察过从未被人研究过的满洲地区和萨彦岭东部北坡。地理协会在亚洲所进行的一系列探险载誉世界。可以说,到19世纪后半期,整个俄国都沉浸在了“殖民语境”当中。一个作家(读者)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或社会的集体想象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绝对脱离集体无意识的樊笼,无论他有多么强烈的批判意识。实际上,契诃夫在《萨哈林旅行记》等作品中叙写中国人的写作策略代表了全社会对某一异国的集体阐释,即“社会集体想象物”。

当然,在契诃夫那里昔日中华大帝国的余威仍存,《没意思的故事——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1889)第二部分中中国形象这样现身了:

看来,即使巴蒂凑着他的耳朵唱歌,即使中国的大军侵入俄罗斯,即使发生了地震,他也不会动一动胳膊或者腿,而会仍旧眯细眼睛,心平气和地看他的显微镜。

看来,赛义德说的不错:“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现在,它正在一天一天地消失。”^①这话用在俄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上同样合适。

考察19世纪晚期俄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时,我们还会发现,19世纪末的俄国作家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存在着两极化的倾向。

冈察洛夫与契诃夫的旅行记宛如一幅写实的平面图,他们利用直接的中国经验,从各自的角度反映出中国的具体情状。与此相反,有的作家像普希金一样,并没有直接的中国生活经验,他们从“远方”注视着中国。凭借着浓厚的兴趣与高深的文化修养,这些作家同样能够正确地把握住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艺术的精髓,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就是其中的一位。

就在大部分欧洲知识分子开始轻视中国时,托尔斯泰像歌德一样却越来越重视中国。托尔斯泰对于中国人始终抱有好奇,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十分崇拜并创造性地加以吸纳。托翁晚年的力作、一生思想的辑录——《生活之路》(1910)集中展现了他对孔子、老子、孟子学说融会贯通的理解与创造。而在其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大文豪只有一次塑造了中国形象,即一篇题

为《中国皇后西陵氏》的儿童故事。故事极短,全文如下:

中国轩辕帝有个爱妻西陵氏。黄帝想让全体百姓牢记他宠爱的皇后,就叫她去看蚕,并且对她说:“你学一学怎么利用这蚕,怎么养它,百姓就永远不会忘记你了。”

西陵氏开始观察蚕,于是看到,它们停止活动以后,总是裹在网里面。她解开这网,纺成丝线,织了一块丝巾。后来她又发现,蚕生活在桑树上。她就采集桑叶来喂蚕。她繁殖了许多蚕,而且教会百姓养蚕。

自那以后五千年过去了,中国人直到现在还记得西陵皇后,并且设节日纪念她。(陈馥译)

到此为止,相当于“中国公主”的“中国皇后”形象终于亮相于俄国文学了!托翁塑造这一形象依赖的又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勤劳智慧的中国人”的套话。由此可见,套话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承继性。在托尔斯泰的中国形象中,占据第一位的是“中国人爱劳动”——无论皇帝、皇后,还是农夫,都具有这一美德。在《中国的贤哲》一文中,托翁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反复强调着这一点:“中国人是庄稼汉。他们的皇帝自己也种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劳动中比得过中国人:吃得那么少,干得那么多。而且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比得过中国人那样善于耕种土地并靠土地养活自己……一个男孩一旦满九岁——不管他是帝王的,公侯的,或者是普通农民的儿子——都要进初级学堂,那里教他们耕种、灌溉、挖掘、清洗……”^②在托尔斯泰时代,欧洲普遍浸淫在殖民主义语境之中,而托翁对“异”的向往、对“异”之文化精华的摄取那么一往情深,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似乎就是天堂和神秘的代称。往日重现——中国给予俄国作家的又是普希金般的幻想的可能和力量。

综上所述,出现在19世纪俄国作家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始终笼罩在俄国的国力,中俄两国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关系对比,以及人民心态变化的那架滤色镜下,这就恰如谢和耐所言:“确实,一切社会对他者的看法都是种族中心论的,而这一点因为是由无知产生的便愈发肯定。实际上,这些社会都是根据各自

① [美] 赛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页。

② 参见《中国的贤哲》,载于《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五卷,倪蕊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71—72页。

的社会、政治、宗教、伦理传统,根据各自的精神范畴和各自对人及世界的观念而想象他者的。因此,对外国的描述就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涉及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最内在、最本质的东西。然而,我们也可说,这一看法具有多面性,因为她是随不同时代的风尚和所关注的重点而变化的,因此同一个社会对外国的看法会时而冷漠,时而好奇,时而绝对地赞赏,时而又是不公正地蔑视或仇恨。但产生迷恋或厌恶的原因总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每个人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来定义自我的”^①

^① 转引自孟华:《言说他者,言说自我——序〈中、日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载于《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9年第1期,第28—29页。